

所有制-国家角色双重调整下的资本主义及其困境

董山民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资本主义自工业革命发展至今历经了繁荣和萧条的交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调整。历史上资本主义经过两次重大调整: 一是所有制的调整, 二是国家角色的调整。两次调整不同程度激活了社会创造力和平衡力, 其理论上支持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调整取得了部分成功, 但仍然没有解决成本外部化难题, 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债务危机、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滋生了右翼民粹主义。所有制和国家的双重调整受制于顶层设计, 难言成功。

关键词: 所有制; 国家角色; 调整; 新自由主义; 成本外部化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6-0162-07

近代以来, 国家角色和所有制无疑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要素。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与黑格尔的国家观相对立的是, 马克思认为,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1](536)}。马克思的观念打破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斯密的“守夜人”), 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君权至上的国家观。程广云对此有所揭示: “黑格尔主张君主主权(霍布斯), 而马克思则主张人民主权(卢梭)”^[2]很明显, 马克思认为国家应该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国家角色调整, 实际上就是国家要尽可能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增加共存利益, 否则社会治理将会举步维艰。作为人类社会进行物质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 长期以来被各派思想家密切关注。这种关注在马克思发起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后显得更加突出, “将所有权分为私有和共有, 并向此种观念的主体分野投以批判的目光, 乃是马克思的创造”^[3]。对于所有权的制度实施形式, 周新城认为: “离开所有制, 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 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正因如此, 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马克思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共产党宣言》曾旗帜鲜明地提出: 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4]可以说, 资

本主义发展到今日一直都在不断地调整所有制形式, 因为它关系到一个社会生产力的释放能力。当今资本主义形态的变化, 比如, 从认知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 都在所有制调整上下功夫, 让金融工具、知识技术(当下流行的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符号(交换的数字化、符号化, 譬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认知资本主义, 蔡万焕认为: “‘认知’一词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知识、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等认知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5]根据他的研究, 认知资本主义可以在三个方面得到界定: 资本积累方式、生产方式(知识的生产出现非中心化, 各个生产者在分工中地位平等)以及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劳动者只在极少程度上被剥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关键在于新的生产资料形式的出现, 即数字资本, 对于如何占有这些数字资本, 蓝江认为: “与其将其分割, 不如将其共享, 数字时代的革命口号, 不再仅仅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也包含了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 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 一个基于共同数据的未来共同社会正在数字时代的地平线上露出它的曙光。”^[6]笔者没有蓝江那么乐观, 无论是认知升级, 还是数字共享, 如果不联系国家角色的调整, 让国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认知不平等、数据垄断就不是一种可能性, 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因此, 本文试图在

收稿日期: 2018-03-09; 修回日期: 2018-09-2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典实用主义现世信仰的义理及其践行研究(18BZX111)”

作者简介: 董山民(1973—), 男, 湖南祁阳人, 哲学博士, 中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哲学、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联系邮箱: hanhanlv602@126.com

宏观上考虑所有制和国家角色，只有在更宏观的视野下，我们才能找到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实现更大平等的路径。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成本危机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诞生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番波折。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虽然没有全面取代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同高明的医生给病人剷除了肿瘤一样，使资本主义走向了不断自我调整的道路。马克思曾经提醒人们：“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7](311)}。根据这种原则，人类在不断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中取得进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彻底解决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它的内部蕴含了无法克服的危机。马克思指出的问题也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长久地在成本外部化的条件下完成社会再生产，因为那些被外部化的成本必然以曲折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成本。当企业需要降低成本，而不使用最先进的防止环境被污染的措施时，初看起来，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但是，在一个产权清晰的社会中，这样做可能带来互相冲突的后果：一是排污企业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甚至超过不安装环保设施节省的成本；二是一旦环境污染以后，企业员工可能面临疾病的威胁，企业不可能完全免除为职工支付医疗费用的责任。如此，社会成本重新回到了企业内部，尽管企业可以迁出已遭到污染的生产区域，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转移生产场地只是权宜之计，问题迟早会来。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到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8]各种恶化的状况会在整个系统内蔓延开来，资产阶级并不能全身而退。当把全球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体系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支付的总体成本并没有减少。个别企业逃脱厄运，但是资本主义整体并不能因此处于更好的状态。企业成本外部化的另一种渠道是，用科技创新的成果代替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生产总成本，以取得资本积累，但是，被驱离工作岗位的职工将成为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为了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存权，增加税入、扩大财政开支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即个别

生产企业可能因为裁员而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利润，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生产的体系并未改观。可以说，资本主义实现持续繁荣需要成本外部化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讽刺性的是，正是成本外部化导致了资本主义造血功能衰竭。

马克思曾经批评李嘉图、萨伊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为资本主义辩护。他们构想了一个永不失灵的市场，在那个市场里存在一种充分而完全的竞争，这种竞争使生产资料使用的效率达到最大值。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张五常说：“交易费用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可预知的效应：第一，它们会减少交易量，因而会损害资产的经济专门化与资源的利用；第二，它们可能会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密度；第三，它们会影响合约安排的选择。”^{[9](103)}按照这个理论，我们知道，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参与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从未享受交易成本为零的待遇。科斯说：“实际上，几乎不需要分析就可以说明理想的世界比自由放任状态要好，除非两者的定义恰好是一样的。但是，整个讨论大多与经济政策问题无关，因为不管我们心中所想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显然我们还没能找到任何从我们所处状态过渡到那种状态的办法。”^{[9](38)}古典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勾画的蓝图遭到了重大挑战。沃勒斯坦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秘密：

现代世界体系中有很多这样的机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即在这个系统的历史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机制，我称之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

首先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生产者需要准垄断来积累可观的资本。只有在准垄断的情况下，生产者才能以远远高出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在存在真正竞争，生产要素可以充分自由流动的系统中，任何精明的买家都可以找到愿意以一分钱的利润甚至是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的卖家。存在真正竞争的体系是无法产生真实利润的。真正利润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限制，也就是建立起准垄断。

准垄断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形成：①产品有创新，从而存在(或能够催生)足够多愿意购买的买家；②一个或多个强力国家愿意动用国家力量阻止(或至少是限制)其他产品进入市场。简而言之，准垄断只有在市场无法独立于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存在。^{[10](11)}

沃勒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资本主义无法靠市场就能完成再生产，国家的力量必须参与进来，而所谓的“市场万能”只是神话。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具有自我纠错和恢复平衡的能力，可

是,现实的情况是,陷入各种困境的人在丧失基本生存资源后,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隐患和冲击,流血、革命经常爆发在资本主义萧条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需经过无数次调整才能续命。大体而言,资本主义调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所有制调整,二是国家角色调整。前者通过股权改造进行,后者以福利国家的形式济困。先看看学术史上发生的围绕所有权的论证,再看看福利国家的局限。

二、围绕所有权的论证

从所有权的论证出发了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调整路径,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所有权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形式,而所有制是法权形式的制度安排,前者是后者的法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应用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家不一样,马克思不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财产并不先天被某人所有,进而成为社会分化和压迫的条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制逻辑上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私有制,二是公有制。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事实上还会存在并运行混合所有制,那只是私有制和公有制按照某种方式和比例混合在一个社会里。划分两种形式的前提是,所有权如何可能?通俗地说,谁、凭借何种理由主张对物的权利?马克思说: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人对土地的私有制,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制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一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11](875)}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对于土地,人们可以谈论的只是占有者和利用者,而不是所有者,不管是私有还是共有。很显然,马克思与主张劳动所有的洛克是不同的。马克思拒绝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讨论问题,并不共享洛克以宗教信条作为前提的论证,洛克的论证却特别依赖下述论断:

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12](19)}

洛克承认上帝在劳动者取得所有权的活动中占据

的地位。马克思并不承认这一点,相反,他认为这种建立在宗教或形而上基础之上的所有权主张非常荒谬。除开抽象的论证,围绕所有权人们主要的争议在于土地所有权。在洛克时代大致存在两种论证:一是基于契约的论证,二是基于效用的论证。

基于契约的论证从两个角度展开,第一,神与人是创造和受造的关系;第二,人与物的关系同样以上帝为中介。一般而言,土地和人都属于上帝的造物:人之为人在于上帝的创造,土地也属于上帝的创造。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借助上帝这个中介。同样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通过与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即人与人是平等的,只在他们都是上帝的造物的意义上成立。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人只当作工具,而要作为目的对待。要做到后者,则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这个逻辑前提对于所有权的构建意义重大。据此,所有权第一层论证如下:

- ①无人先验地拥有外物的所有权,除非:
- ②某人承认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同意。

除非得到他人的同意,否则,不要说对外物拥有所有权,就是通过劳动改变外物的原始风貌,也不能成立。劳动之发生,其先决条件是遵守一种人与人之间表达或默许的契约,即未经任何他人同意无人能够在土地上劳动。根据这种逻辑,洛克的劳动产生所有权只能在第二层意义上发生。授权劳动是劳动产权的前提,显然是先验论证。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所有权的发生是经验层次的,即主张所有权的人只要得到了与他存在互动关系的人的同意,就可以劳动。尽管这样说,事实上劳动的产生并非按照同意-契约的方式进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放弃形而上的契约论证,基于效用的论证更有可能得到辩护。洛克的效用论证如下:

这是可以肯定的。人们的超过需要的占有欲改变了事物的真实价值,而这种价值是事物对人的生活的功用而定的……我试问,在听其自然从未加以任何改良、栽培或耕种的美洲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一千亩土地对于贫穷困苦的居民所提供的生活所需能否像在德文郡的同样肥沃而栽培得很好的十英亩土地所出产的同样多?^{[12](24-25)}

洛克由此推出他的劳动取得财产权的说法:“由此可见,虽然自然的東西是与人共有的,然而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还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当发明和技能改善了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的时候,他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或享受的大部分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并不与他人共

有”^{[12](29)}。

其实，洛克的论证包含效用方面的考虑：一是取得所有权的劳动使得土地相较于原始状态产生了更多价值。二是取得所有权的方式没有损害他人。换一种方式表达，洛克的论证遵循两个原则，即不损害原则和不浪费原则。这两个原则都以效用为基准。所有权之所以成立在于：一种制度或惯例处在让总体利益实现增值，同时并不减损任何个体利益。诺齐克批评洛克的劳动概念是模糊的，但是，联系洛克强调劳动的增益性，诺齐克所谓把番茄酱倒进海里的“劳动”显然并不实现效用的增加。很明显，如果人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那么，这种活动就会得到激励，即取得所有权的劳动具有预期中的激励作用。不限于此，劳动产生的产品使得合作的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因为原始状态并非是人人愿意接受的理想状态，取得所有权的劳动活动，即生产，使得初次分配成为现实。质言之，取得所有权的劳动不但具有激励作用，而且兼顾社会保障作用，两者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须。激励让更多的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产生出来，保障社会运行有序。

根据这种路径，建立在这种所有权论证上的一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可以得到辩护。但是，私人所有制的激励和保障作用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呢？换言之，私有制是否具有普适性？马克思对这种所有制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私有制从来不是理论设定的，而是历史形成的；第二，私有制的激励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反过来伤害了保障作用。这使得私有制既得不到科学辩护，也得不到道德辩护。对于第一点，人们很好理解；而对于第二点，争议较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是，工人的贫困恰好是资本家极度富裕、甚至奢侈的条件，即劳资双方零和博弈。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牺牲保障而不会提供保障。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激励了各种各样病态的需要，这种病态需要让无产阶级的正常需要显得多余。马克思说：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269)}

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能否自动修复被损害的劳动力，在驳斥詹姆斯·穆勒、托伦斯、西尼耳等人的观

点——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而且必然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佣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时，马克思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在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的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13](507)}

人们发现资本主义不会让自己的利润成为社会保障的来源，相反，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资本家常常陷入资本不足的恐慌和压力之中。为了摆脱不可预期的市场前景，资本家理性的做法是降低生产成本，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然后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出去。非常吊诡的事情出现了，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工人维持自身劳动力生产和繁衍后代的费用，额外的消费支出从何而来？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不会把价格降低到工人能够购买的水平。当每个资本家都这么做时，工人无力购买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了。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让自己无法运行，遑论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效用。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其内部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危机，调整不可避免。

三、所有制调整及其后果

如果以上论证没有问题，那就意味着私人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公理。既然它作为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提供者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面临两种可能：一种是内部调整，另一种就是被其他所有制取代。就像马克思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所有制的调整恰好是生产力释放的方式。为了延续自己，当代资本主义采取了内部调整的路径。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初级生产资料基本上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中，然而，让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可能的劳动力商品化使得工人丧失了对于劳动的热情，劳动者只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手段，此时一切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幻想都在雇佣工人那里消失了，因为工人没有能力实现形式上的权利。这种所有制结

构导致资本主义实现积累的目标变得缺乏广泛而持久的支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资本主义在20世纪进行所有制调整,其基本目标是所有权社会化。具体做法是让雇工以持有股票的形式重组整个社会的产权结构,那些高级职业经理人甚至成了大型股份公司的重要股东。股权结构的改变表面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得组织中的个体受到了更大的工作激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变。它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雇佣工人,哪怕是高级雇佣工人,对公司或组织的异在感和敌对情绪,这种做法符合资本主义降低成本、赢得竞争的策略。

所有制调整后,马克思时代那种简单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对抗的残酷事实得到了缓和。“中间阶级”应运而生。所谓中间阶级,就是很难准确地把它放在哪个具体阶级的“社会成员”,这里存在实践和理论上的灰色地带。我们可以在埃里克·赖特那里读到对“中间阶级”的论断:

有一点通常并不明确,即包含“新阶级”这一类别下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如何分享以剥削为基础的共同的利益,或者如何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据相同的地位。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资本主义的公司中居于管理地位,直接支配着工人,甚至可能参与对投资的控制。有些人是政府的雇员,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对其他雇员(如教师、护士)实施控制。有些人可能是资本主义公司中的技术雇员,处于管理的阶层之外,只从事其上司给他们布置的特定工作。尽管这些不同的地位可能会因为教育和专业知识而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特征,还是难以把他们看作是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相同地位、分享共同的剥削利益,从而根据阶级的一般概念所列出的标准构成的一个单独阶级。^[14]

当然,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不必然由所有权关系直接带来,现代生产和管理的特殊需要迫使资本主义社会调整其阶级关系,有时这种调整甚至是历史趋势。但是,所有制的调整让原来被雇佣的群体具有了资产,却是事实,尽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更深地陷入了被大资本家控制的网络中,但是,大资本家却失去了人格化特征,滑向了非组织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让资本的主体分散在社会之中,但实质上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本积累的形式隐含在社会不得不消耗的各种机制中,人类变得离不开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和“租金资本主义”就是两个用来描述新型资本主义的概念。前者在拉扎瑞托的新著《债务人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其一它剥夺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其二它扩展了股票持有者对私营企业这一核心机构的

控制;其三它使生命政治的重心从社会权利转向社会债务。汪行福这样评价拉扎瑞托的债务经济概念,“总之,作者认为,债务经济让资本以更险恶和更广泛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因而,对它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15]。通过调整,原先的私有产权被稀释到社会各阶层中,对抗性压力被缓解了,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似乎具有了资产占有人的表面形象,一旦产生自己就是有产者的幻觉,也会认同新型的资本主义,甚至为它辩护。

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工人阶级很容易找到敌人,可以明确地采取措施针对自己的敌人,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调整以后,工人阶级的敌人消失了,或者说弥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找不到明确而固定的阶级敌人,但他们却无处不在。奈格里和哈特描述了这种情况:

帝国的控制不再通过现代国家的规训模式得以实施,而是通过生态政治的控制模式进行的。这些模式以一群具有生产性的民众作为基础与目标,这些民众不可能进行编组和规范化,而必须加以统治,即便以其自治的方法。“人民”的概念不再作为监控系统的有组织的主体起作用,结果“人民”身份便被流动性、弹性和民众的永久分化所代替。^[16]

所有制调整的目的在于化解政治压力,其中一种所有制调整带来了租金资本主义,租金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工薪资产阶级。所谓工薪资产阶级,就是具有某种独特技术的工人,譬如,掌握最先进互联网技术的雇员,从非物质劳动中,或者从知识产权的占有权及其应用——技术入股——中获得了额外收益。技术工人被纳入了资产阶级群体,阶级划分的界限更加模糊。马克思以前预设的纯粹的阶级队伍很难在新的历史境况中找到对应的力量,这种状况使得资本主义缓解了危机。质言之,资产阶级消散在普通大众中。之后,他们自觉运用资本主义方式谋取利益,并依附于给他带来更大满足的制度。

所有制调整使整个社会呈现全民皆为资产阶级的色彩,其实,隐没在全民资产阶级中的真正主宰资本积累的力量却从未消失,而以另外的形式支配着资本的分布和扩张。总之,产权分化和弥散使资本主义更隐秘地控制了社会。

四、国家角色调整的局限

资本主义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重新定义国家的作用,属于外部调整。这种调整通过两个渠道表现出来:

其一是福利国家的思想和实践；其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民族-国家更加广泛、深入地加入了全球竞争。如果说福利国家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减少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成本，最终维系资本主义竞争力，以实现长久而稳定的资本积累，那么，众多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民族-国家对内尽量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市场主体，但是，对与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民族-国家，就不再采取中立态度，相反，它创造条件让本国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具有准垄断性、甚至垄断性的条件，从而赢得全球范围内的角逐。

先看福利国家在西方的兴起。在古典自由主义被广泛接受的时代，国家的角色是消极的。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的“国家”观念，还是奥地利学派的“最弱国家”概念，国家都被放在一个消极的位置。持这种主张的人有两个理由：一是国家权力的介入，势必增加行政管理的成本，降低资源使用的效率，进而损害个人自由；二是市场具有自组织能力，按照一个神奇的系统，通过自身力量完成各种资源的高效分配，并弥补竞争中失败的人。根据这样的观点，国家只能市场不能或不愿意进入的领域发挥作用。19世纪60年代后，尽管俾斯麦在德国推行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政策，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被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重视。只有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才从经济学上论述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凯恩斯试图让人们相信，通过国家兴建公共项目和工程的做法可以拉动就业，增加财政支出，帮助陷入困境的人口，进而提升有效需求、恢复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尽管凯恩斯影响巨大，但各国很少采用这种新的经济教义。二战后，“福利国家”的概念才被很多欧洲国家普遍接受，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①推动了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从此，逐渐增加国家财政开支以支持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成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潮流。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从诞生伊始就争议不断。一个最常见的批评是，它到底是帮助了那些得到了福利和救助的人，还是损害了他们，使之能力增长停滞、甚至丧失？福柯在接受罗伯特·波罗(Robert Bono)的访谈时说，“不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何种积极作用，它都具有一些负面效果：某些机构日益僵化，并制造出一些依赖形势。这些负面效果是内在于这种体制的：一方面，我们给予人们更大的保障；另一方面，我们提高了他们的依赖性。相反，我们应该期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既让我们免遭危险，又让我们不致陷入那

些将贬低或抑制我们的情形。”^[17]高福利国家在社会上激发出新的阶级矛盾——即有创造性的人、勤劳的人事实上供养了懒汉，而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被有效利用，相反，它削减了人们努力的动机。通过税收转移到他处的资源，很可能被低效消耗了，而这些出现严重效率损失的资源本可以以资本追加的方式投放到技术开发中去。福利国家的批评者认为，福利国家的实践既没有带来公平，也没有确保效率，仅仅剩下道德意义。一个更加糟糕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鼓励了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使得受帮助者有机会为自己的糟糕状况申辩。然而，这种为自己的福利寻求辩护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让资本主义增长乏力。金融危机后，南欧和西欧国家就为这种错误的调整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这种状况在大量伊斯兰难民、移民进入北欧国家后更加明显，他们造成社会撕裂，甚至引发当地民粹主义。

我们再来探讨资本主义国家角色调整的第二种方案，即民族-国家直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具体路径之一是像美国那样的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加大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像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美国除了确保本国商业竞争者在市场上取得准垄断地位以外，还直接运用政策杠杆推动美国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取得优势。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咄咄逼人，在美国取得突破性商业扩张之际，美国政府直接推动了美元对日元的贬值，让美国相对于日本的巨额贸易赤字得到缓解，整体经济的劣势得到扭转。大卫·哈维说：“简而言之，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丧失了霸主地位，并开始需要政府对其加以扶持(比如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美国政府同意美元对日元贬值，以使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出口更具有竞争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出现停滞，美国政府又被迫实行美国对日元升值的政策)。”^[18]美国还利用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迫使其他国家直接购买美国国债，以维系美国消费主义的畸形经济模式。那些需要依靠美国以消除产能过剩的国家，比如日本、中国，其中央银行不得不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融资，购买美国国债，借此资助美国维持高位运行的消费驱动型经济，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

上述做法，在20世纪之前，对那些信奉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自由竞争、开放市场，但是，当另一种资本主义形态，比如像日本那样的依靠国家规划产业方案、引导外向型出口贸易的经济实体在全球范围取得节节胜利之际，

美国不得不调整竞争策略。换句话说,以日本为典型的“东亚雁阵模式”,利用国家增强企业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换来经济高速增长,使得美国不再能为自己的商业组织提供准垄断的竞争地位,相应地,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缩小了份额。美国政府做出重大调整的出发点是让自由放任的市场变成受到国家约束的市场。在分析美国经济高涨的原因时,詹纳的论述非常生动:

当里根在他的讲话中持续不断地宣称不受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信条时,在现实世界里国家却为了避免私人经济破产的威胁而不断地施与资助和挽救。新自由主义信条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任何的国家促进措施只能歪曲竞争并且成为阻止经济创新的力量。但事实上不仅由日本的例子证明,而且美国的例子也反驳了这种信条。……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公司沿着日本公司的足迹前进——日本则被自己的工业政策武器打败了。^[19]

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不过是美国实施干预经济活动的计划时向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挥舞起来迷惑对手的幌子,其背后是美国用日本的办法打败了日本。美国的做法同样被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采用,德国就是成功的典范。目前美国正在对中国采取同样的策略,只不过这次换了体制不一样的对手。

五、结论:走不出的困境

资本主义实施的所有制-国家角色双重调整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美国的经济信条从信奉自由竞争、开放贸易转向国家干预市场定价、增强商业组织的竞争力,这样做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当美国祭起这样的法宝时,其他国家同样可以采用,其结果是全球陷入恶性竞争,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将变得昂贵。美国自然可以利用技术优势制定其他国家都要遵守的规则,但其他国家为了挽救在竞争中的“颓势”,结盟就可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首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相反,它会在国内带来持久反弹。为了让本国产品和服务取得优势,国家不得不投入巨大成本,以保障本国商业持续繁荣,国家用于改善福利支出的份额将会减少,阶级矛盾将会随之激化。

固然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水平和政治活动之间寻找

并确定因果关系,否则又会掉入一元决定论的泥潭。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实际上,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经济不是经济现象而是政治行动。

注释:

- ① 《贝弗里奇报告》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组织编写的,全名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可以说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先驱读物,它是制度发展的经典著作,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曾影响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被业内人士视为福利国家的基石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为无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保障工作者所推崇、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
- [2] 程广云.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转向[J].哲学研究,2018(2):16-23.
- [3] 张文喜.马克思所有权批判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J].中国社会科学,2016(8):4-23.
- [4] 周新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4):14-23.
- [5] 蔡万焕.认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8):49-57.
- [6]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26-3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
- [9] R.H.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2014.
- [1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M].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5.
- [12] 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埃里克·赖特.阶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4-45.
- [15] 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
- [16] 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31.
- [17] 福柯.自我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4.
- [18]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4.
- [19] 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34.

(下转第195页)